

人口结构调整与 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

■ 张 翼

[摘 要] 要建立人口均衡型社会,就必须处理好人口内部结构的均衡问题,以及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问题。但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缓慢的,社会经济发展本身与人口密不可分,故短期内只有通过人口结构的调整,使之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均衡。就当前中国人口,结构均衡最重要的问题是:少儿人口性别比的均衡;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人口内部不同人力资本结构的均衡;人口地区分布的结构均衡;人口的城乡结构均衡;人口的阶级阶层结构均衡。

[关键词] 人口均衡型社会;自然环境;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10)06-0047-05

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均衡与非均衡关系。人口的流动、出生、死亡等,不仅对一定地域范围自然环境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而且对人口自身及社会经济建设等,形成某种程度的压力。人口变迁总会或多或少改变既有人口布局,在人口结构、人口流迁与自然环境之间造成非均衡状态。因此,从相对均衡到非均衡再到相对均衡,是人口变化的必然趋势。马尔萨斯对人口数量与物质资料供给之间关系的经典讨论,就集中在数量增长对物质资料供给非均衡的影响上。而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社会存在形式的剖析,则是基于人口社会属性变化对原有均衡状态破坏所做的经典描述——即在社会人口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中,探究社会内部人口阶级结构的既有均衡遭受倾覆的原因,并进而洞悉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

人口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出现非均衡状态,有时会经过一系列消极的、或者积极的相互影响,或经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的调整,重新使一定地域范围内人口处于均衡状态,并使人类社会回到发展常态。当然,如果人类社会不能通过自身结

构的调整并藉此协调其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则自然环境会通过较为漫长的演变,强制性地重构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并使之重新与人口的存在形式相适应。如干旱、洪灾、风沙、疾病、资源短缺、抑或泥石流等,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损失。因此,人类自觉地、积极地、富有预见性地对自身内部结构或自身与自然环境关系进行调适,不仅会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或灾难,而且还会赢得发展机遇;不仅使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尽可能相对均衡,而且也同时协调人口自身的各种结构,使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理论的提出,是在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重大压力下对既有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人口均衡型社会理论的建构,则是在继承此“二型”社会的基础上,将人类对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等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三型”社会的建构中进一步完善。

因此,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所涉及的问题,可以被概述为这样几类:其一,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均衡问题;其二,人口内部的均衡问题;其三,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均衡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人口数量与自然环境的均衡问题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早期,人类对资源的利用能力很低。相对于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环境的反作用力更强。不管是在采摘社会和游牧社会,还是在整个农业社会,食物不足、疾病袭扰、气候变化、战争屠戮等,都过早地结束了人的生命。只是在农业社会晚期或在工业社会,食物革命与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内部阶级关系的改善,公共资源分配的相对公平等,才使得人均预期寿命有了大幅度的延长。比如说,中国在建国之初的人均预期寿命就仅为 35 周岁,但直到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的建立健全过程中,才迅速将预期寿命提高到 60 岁左右,并在现在延长到 73 岁左右^[1]。

所以,为保持种的繁衍,人类不断开发可利用资源改变生活与居住环境。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均衡关系,在有些时候,为人口增速超过物质生产所打破;在有些时候,则为人口不足限制其改造自然的能力所影响。因此,一个社会人口数量迅速缩减之后

的人口恢复与增长,往往与这个社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古代君王发动战争的目的,除攻城略地之外,就是掳民。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到近现代之前,主要是人口的不足限制了人类社会顺利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免遭恶劣环境的肆虐,人类经常选择在江河湖海之滨、水草肥美之原生息。也就是说,凡人口集聚之地,必是水资源、草资源或土地资源富饶之地。当然,对于某些贫困家庭来说,人口的阶级属性使得他们即使处在人口不足的大环境中,也会饱受家庭人口增长之苦,不得不采取杀婴的方式减少抚养压力(李中清、王丰,2000:8)。

工业社会改变了农业社会的那种自然再生产与人类再生产的安排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医学科学的大发展。这极大地控制了传染性疾病的大规模发生。传统社会大战之后的大疫,几乎很少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丰足了食物供给,从而极大地改善了营养状况。人均寿命的延长,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使地球上所有种族的人口数量都迅速增长。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利用资源范围的拓展、活动范围的扩张,也改变了原有自然环境结构与资源利用模式,使整个 20 世纪地球上的人口迅猛增长。在 1830 年世界人口仅 10 亿多;但在 1930 年却突破了 20 亿;1960 年突破到了 30 亿;1975 年突破到了 40 亿;1987 年突破到了 50 亿;1999 年突破到了 60 亿。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之下,到 21 世纪中期,全球人口会突破 93 亿。

故二十世纪以来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地球人口“爆炸”的历史,也是人类为繁荣自己的生活而迅速消费资源的历史。在整个农业社会及其之前的历史,人类的能源消费主要依赖于树木柴草等可再生资源,但在工业社会却大量开采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能源的大量使用,打破了人类与资源环境原有的均衡基础,影响了气候变迁、提高了地球温度、增加了碳排放、灭绝了很多生物和动物(Lester R. Brown and John Young, 1990; 彭希哲、朱勤, 2010)。面对这种情况,人类开始自觉意识到了数量膨胀对环境的压力,开始自觉控制人口增长。这才使 20 世纪后期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趋于减缓。发达国家率先开始控制人口增速,并相对改善了人居

环境。但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仍然较高,故在 2050 年左右,地球上的人口总数的净增加额,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如亚洲、非洲国家人口的增长。也就是说,自现在开始到本世纪中叶地球净增加的 30 亿人口,会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在发达国家,如德国、法国、日本等,人口增长率已经为负。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最大的困扰是刺激生育但生育率却长期低迷的问题。

全球存在的人口分布与人口发展阶段的非均衡性,也类似地存在于中国。比如说,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很慢,但农村人口的增速却较快;东部地区人口增速较慢,但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速却较快。截止到 2008 年,北京、天津等城市人口的自增率为 3.42‰和 2.19‰。整个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自增率分别为 1.10‰、1.61‰和 2.23‰,但西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的自增率却分别高达 10.30‰和 11.17‰。但正是新疆与西藏等西部地区,人口数量对自然环境的压力日渐增大。所以,人口增长的非均衡性,不仅影响着全球人类共同体的安全,也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内部的结构性均衡

人的社会性特征,是基于人的动物群体性特征发展而来的。为维护种的繁衍与既定的生活秩序,人口本身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逐渐形成某种程度的均衡结构,以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在这些均衡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性别结构均衡、年龄结构均衡与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结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结构的均衡。

从性别结构的均衡上来说,人的两性之间的均衡——特别是婚龄年龄段人口的两性均衡,是婚姻制度——尤其是一夫一妻制得以维持的基础。在正常情况下,婚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均衡,取决于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均衡,一般以每新出生 100 个女婴相对应的男婴的数量来度量。从国际经验来看,正常值一般在 105±2 左右——新出生男婴的数量较女婴稍多一点。这样,在少儿人口男性死亡率大于女性死亡率这个人类生物性特征的影响下,到婚龄年龄段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大致均衡。如果出生性别比超过了 107,或者大大低于 103,那就会造成未来婚

龄年龄段女性或男性的短缺,形成“婚姻挤压”,使婚姻市场上那些缺少竞争力、找不到配偶的人的人数大幅增加,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并扰乱既有的婚姻秩序。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严格执行而迅速攀升。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1981 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08.47;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得到的 1989 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 111.92;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为 116;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在《200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公布了 2006 年中国人口的出生性别比为 119.25。自此开始,每年的统计公报都公布上年的出生性别比,比如说,2008 年是 120.56^[2],2009 年是 119.45^[3]。如此之高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会直接影响这个年龄同期群人口到婚龄期的婚配问题,造成大量光棍汉的存在,影响社会的稳定。近期偏远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青年数量的增长,一个主要原因就来自于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生性别比的失调。

在追求人口性别结构均衡的同时,还应该着力维持与一定生产力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均衡,使少儿人口、劳动力人口与老年人口之间存在的抚养与被抚养关系,在一定均衡范围内维持社会发展与进步之所需。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与其社会发展阶段不相适应,则人口供给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仅会出现总人口的下降(比如德国与日本),而且会存在劳动力人口的供给不足问题(德国与日本——甚至于整个西欧都存在此类现象)。所以,静止人口是人口学家设计的人口理想型(即总和生育率在 2.1 左右的人口再生产模型)。但在现有的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将自己的国家转型为静止人口。所以,在人口迅猛增长时期,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比较大;在人口缩减时期,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占比。中国现处于工业化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在社会宏观层面成功地控制了人口数量的增长,在家庭微观层面缩减了夫妻的子女数,使其有能力为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资,提高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但与此同时,我国还需注意到: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加速了。中国是未富先老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社会发展老龄化与政策性老龄化的双重特点。在社会保障与企业技术水平尚未根本提高的情况下的老龄化,势必会影响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在,中国处于人口红利期,但很快就会出现人口负债——大约在2020年之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迅速提高,而大约在“十二五”末期到“十三五”初期,劳动力人口会在波动中从净增加变为净减少。因此,自2003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实际表现为劳动力由“无限供给”转变为“结构选择”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占据主要比重的前提下,我国劳动力人口——尤其是青年壮工的供给却减少了——2010年新增加的农民工人数仅仅在200万左右。这会更加强化未来数年企业普工的短缺趋势。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密切。也就是说,只有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力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形成均衡关系,产业发展与产业转型才会降低失业率而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德国(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就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度短缺,但东德向西德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部分劳动力所需。然而在1961年柏林墙建立之后,由于阻隔了东德移民的进入,西德不得不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等国签署劳动力进口协议(guest worker)。中国自1999年开始的教育扩张速度,远远快于企业技术升级速度。从2010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结构上看:高中阶段劳动力供给1000多万人,全日制大学生毕业生供给却达到了空前的630万人。因此,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力,但初中及以下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却居高不下。这就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迅速提高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之间形成鲜明反差。所以,自2003年开始,一方面是农民工的大面积短缺,另外一方面却是大学生的就业难。到最近几年,甚至于出现了大学生不得不做农民工工作的局面。这就是说,产业结构的更新速度,慢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的速度。另外,大学生专业供给与市场之所需也矛盾重重。这就出现了劳动力人力资本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

衡性甚至于会长期影响中国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走向。国务院不得不在2009年年底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作为中国的首要问题加以强调。

三、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均衡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的社会属性与区位分布应该具备一定的均衡性。如果这种均衡得不到满足,则社会就不能顺利发展。比如说,考察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就会发现:2008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1.3%、48.6%和40.1%。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所占比重分别为39.6%、27.2%、33.2%。如果以三大产业占GDP的比重为准,则中国已经进入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如果从三大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分析,则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农业社会特征。这就出现了产值与从业人员分布之间的非均衡性。这种非均衡性的存在,加之户籍制度的影响,使中国长期城市化不足,迫使大量农业户口人口不得不居住和生活在农村,也迫使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往来迁徙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另外,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只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段从事农业生产,而将更多时间集中在非农就业上。比如说,除家庭经营收入外,在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占现金收入的比重就已达33%左右——而这些收入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城镇或县城企业的做工收入。可这些人仍然被固化为农民。由此也使2009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46.6%左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仅严重影响着农村的发展,而且还难以在短期内提升内需,迫使中国不得不继续依靠出口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所以,基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城乡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均衡,是既能够保障粮食生产自给,又能够节约土地资源、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强烈依赖的均衡。但土地制度与城市对流动人口的限制,仍然约束着城市化速度的提高。

另外,劳动力结构的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阶级阶层结构的均衡,而阶级阶层结构的均衡,则主要取决于收入结构的均衡。如果劳动者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则会严重影响消费占比,并通过对消费的作用影响劳动力人口的代际再生

产。时下的中国,农民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高达40%左右,体力工人阶级占20%左右,技术工人阶级占10%左右,中产阶级占23%左右。业主阶层与社会管理人员阶层虽然占人口总数的比重在7%左右,但他们却占有整个工资收入总额的30%以上^[4]。现代化国家的阶级阶层人口结构,是中产阶级人口占比最大的鹅蛋型结构,而不是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人口占比最大的金字塔结构。中国这种金字塔型人口阶级阶层结构特征,不仅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稳定,也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精英再生产。如何通过教育与就业制度的建设,消除阶级阶层结构差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我们社会的流动特征,更多地体现为重能力而轻家庭背景,是均衡人口的阶级阶层结构的一个有效路径。而当前制度配置的重点,在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紧张态势,使职工能够均衡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过上“有体面”的生活。

总之,在进入低生育时期以后,中国人口的转变特点,使人口数量与人口内部结构、资源、环境、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有些自然科学家,更希望以较少的人口维持更加绿色的资源环境。但与他们对应的社会科学家,则更看重人口转变过程本身对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不管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有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认为:在人口转变既定的情况下,人口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结构越和谐越好。我们要知道,即使在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的前提下,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也会存在均衡问题。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设施的改善、生产技术的提高等均会改变既有的人口分布格局,打破原有的那种结构模式,通过新一轮的“自组织化”重新形成人口的中心——外围周边空间结构。中国未来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集聚态势,势必在新发展阶段带来新的均衡问题。

对于人类而言,规模经济会带来人口的集聚效应;新资源的开发与原有资源的布局,又使资源环境与人口紧密结合。空间经济学与空间社会学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交通运输与集聚规模之间的关系决定人口的集聚程度。新经济与新资源的开发,在

造成原有结构失衡的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均衡要求。在集聚效应逐渐变负的时候,分散与导流就成为形成新的均衡的必要手段。而人口流动——不管是居住和工作区位流动,还是社会职业流动,都会影响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配置,出现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失衡、人口内部结构的失衡、或者人口供给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失衡。只有使人口与自然环境、或者人口内部结构等维持起码的均衡,才可能求得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绿色发展。在这一发展背景下,加强人口均衡性社会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注释:

- [1]张翼.如何让“新农合”更好地保障农村贫困群体[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4).
- [2]200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90226_402540710.htm
- [3]201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5/content_13047677.htm
- [4]张翼.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J].甘肃社会科学,2009(1).

参考文献:

- [1]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8).
- [2]张翼.让“新农合”更好地保障贫困群体[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8(4).
- [3]张翼.中国的阶层结构与收入不平等[J].甘肃社会科学,2009(1).
- [4]Lester R. Brown and John Young. “Feeding the World in the Nineties,” in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0[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0.
- [5]彭希哲,朱勤.我国人口态势与消费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J].人口研究,2010(1).

作者简介: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教授

责任编辑:李海峰